

太平經

文白
对照

罗炽

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前 言

(一)

《太平经》系汉代道家神仙派造作增广而成的一部典籍。据《汉书·李寻传》：“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贺良等复私以相教……而李寻亦好之。”又据《后汉书·襄楷传》载：“初，顺帝时，琅邪官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覡杂语。”可知是书自西汉即有制作流行，而增广定编于东汉，是一部多人制作、续编的道书。东晋以后始定称《太平经》或《太平洞极经》。

《太平经》按十天干自甲至癸分十部，每部十七卷，后亡佚甲、乙、辛、壬、癸五部，仅存五十七卷。今人王明据其它道书同引之文辑校补遗，参证敦煌本《太平经目录》，成《太平经合校》，大体恢复了一百七十卷《太平经》原貌。

《太平经》制作流传的时代，正是西汉王朝社会极不安定的时代。汉初，统治阶级鉴于秦末暴政激起社会阶级矛盾全面尖锐化，从而导致农民起义而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

使广大劳动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恢复战争创伤，兴修农田水利，发展生产，出现了为人称道的“文景盛世”。武帝时，刘汉天下的文治武功达到当时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也就是从这时起，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否定因素也全面萌发，终于经昭、宣、元帝至于成帝，发展为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汉元帝时，由于外戚、宗室、公主、王、侯、大官僚等政治上的上层权贵，盛行兼并，与当时下层的地主、商贾、豪强之间的矛盾，动摇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以致人心浮动，各思变革，终于在汉成帝时期，首次爆发了汉王朝历史上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包元太平经》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迄于东汉顺帝，它伴随着王莽新政和两汉之际的农民武装斗争而在民间流播增广，终致成为一部内容庞杂的巨著，不为官方理解、接受而遭到禁止。

《太平经》并非为道教立教而作。它之成为道教经典，是因为它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积极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的广大下层人民群众的希望与要求，蕴含了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宗教意识，因而理所当然地被当作一种理论先导而被早期道教的创教人所选择确认。由于在民间辗转相传，故书中掺杂了许多代表民间道教的思想主张，显得庞杂，繁复，且逻辑混乱。尽管如此，但是《太平经》的主旨却是十分明确的。《太平经》曾多次提到：

“其为道乃拘校天地开辟以来，天文、地文、人文、神文皆撰简得其善者，以为洞极之经。帝王案用之，使众贤共乃力行之，四海、四境之内，灾害都扫地除去，其治洞清明，状与天地

神灵相似，故名为大洞极天之政事也”^①，“名为皇天洞极政事之文。”^②

“天师之书，乃拘校天地开辟以来、前后圣贤之文，河洛图书神文之属，下及凡民之辞语，下及奴婢、远及夷狄，皆受其奇辞殊策，合以为一语，以明天道。”

“乃怜帝王在位，用心愁苦，不得天意，为其每具开说，可以致上皇太平之路。”^③

这说明《太平经》的造作初衷，是为时君世主治理天下、安定社稷，排忧解难、贡献策略。经书是上使其“明天道”的“政事之文”和“河洛图书神文”易“道”，下取诸民间百姓和少数民族的风俗遗训。目的在于“去乱世，致太平”，“顺似伏牺之作八卦，用以通神明之德。以“太平”名书，是为了使“帝王立致太平。”《太平经》解释说：

“太者，大也。乃言其积大行如天。凡事大也，无复大于天者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平者，比若地居下，主执平也，地之执平也。”“天气悦下，地气悦上，二气相通而为中和之气，相受共养万物，无复有害，故曰‘太平’。”^④

“太者，大也；大者，天也。天能复育万物，其功最大。平者，地也；地平，然能养育万物。经者，常也；天以日月五星为经，地

① 《太平经》卷四十一，《件古文名书诀》第五十五。

② 《太平经》卷第九十一，《拘校三法古文法》第一百三十二。

③ 《太平经》卷三十五，《分别贫富法》第四十一。

④ 《太平经》卷四十八，《三合相通诀》第六十五。

以岳渎山川为经。”^①

可见《太平经》实为一种救世的宗教学说。它的终极关怀，乃在于天地之间“凡事悉理，无复奸私”、“无复有害”，实现一种“治太平均”、“共养万物”、稳定不变的生态平衡、中和自然的人类社会。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汉初黄老学无为之治的所谓“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的缅怀与追求。

《太平经》的产生，除了社会的政治的缘由而外，还有着深厚的思想缘由。自秦焚《诗》、《书》百家语外，《周易》等卜筮、种树之书幸得保存，黄老思想亦得以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有汉一代，黄老之学一直实际上受到人们信仰。诚如韩愈所言：“周道衰，孔子歿，火于秦，黄老子汉。”^② 历考贾谊、晁错之论，太史公对儒、道的抑、扬之评，以及成为时尚的《黄帝内经素问》、《老子河上公章句》、《淮南鸿烈》诸书，无不弥漫出浓厚的黄老气息。武帝时，董仲舒投其所好，建言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得以在经学的形式下复苏。然其骨子里依然流淌着黄老的精髓。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毋宁说是一部以道释儒的失败之作。经学终于墮落于谶纬的泥潭。而《白虎通义》、《太玄》、《道德经指归》《老子想尔注》和黄老养生之书如《周易参同契》等继续在社会上产生着重要影响。甚且连著名的无神论者王充也难以跳出“祥瑞”之说的窠臼，以“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③ 自慰。关于这一点，近年来出土的《文

① 《太平经》卷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七十，《太平经钞》癸部。

② 《原道》。

③ 《论衡·自然》。

子》、《黄老帛书》亦是明证。《太平经》正是在这种环境里酝酿出来的。它的思想，体现了以黄老道家神仙方技厄流为主的儒家经世学说、谶纬巫术、墨家的社会理想和西来佛教思想的杂糅。又由于它的世俗化和大众功利倾向，使它得以在民间流传、扩衍而被民间道众创教时选作教典而重新诠释。据《云笈七签》称：“（张）陵自言太上老君亲授四经于己”，其中一种便是《太平经》。今本《太平经》极有可能增益了张陵一类人的诠释之文。^①

（二）

《太平经》是道家《易》学向道教《易》学发展的一道重要津梁。是中华易文化传统在汉代体现的一个典范。

《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它是古代东方原始野蛮人走向文明的文化实践的结晶。是各部落巫史文化的集大成，从而成为华夏民族文化传统的逻辑元点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原典。换言之，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易》文化传统。^②《易》的主要功能是卜筮，为人们行事处世、趋吉避凶提供决策咨询意见。它反映先民们在所处的特定时空环境下的认识经验水平。《周易》的阴阳奇偶（—、--）爻画给了尔后道家、儒家哲学形上学的建立以决定性影响。由《周易》而老子而《易传》和由《周易》而孔子而《易传》，遂成为一源双流，即道家

^①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考证，怀疑《太平洞极经》为张陵著，其书见于《太平经》中。今本《太平经》内容繁复，学者多以为于《太平经》“本文”之外，混进了不少诠释之文，张陵著作即是一例。

^② 详见拙著：《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武汉出版社95年版。

《易》学和儒家《易》学并行不悖、相资互补的对立统一的文化思想体系。道家易学以天地自然和人体自身健康长寿为关怀的起点，由之延及到人君南面之术，从而实现天地人事的阴阳和谐，建立一种自然无为的中和的社会秩序。正如《老子》所说，由“修之身”——“修之家”——“修之乡”——“修之邦”而“修之天下”。因此，它更多地着眼于人自身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环境，诸于人身精、气、神的吐纳、治病延年的药物烧炼以至于天文、历律、节候、地理等方面，所以又有科学《易》(或象数《易》)学的说法。与之相对应，儒家易学主要以人际关系为关怀的起点，由之延及人类所结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依然是统治秩序问题，希望通过有为建立一种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外壳的、和而不同的等级制度化的中和社会秩序。如《大学》所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庄子·天下》称其为“内圣外王”之术。因此，它更强调人的“慎独”、“克己复礼”，人的“恭、宽、信、惠、敏”的道德品格的培养和尊卑、长幼、贵贱等级秩序的构建、纲常伦理的论证与维护。所以又有人文《易》(或义理《易》)学的说法。事实上自《易传》起，儒道二家便相互渗透，汉《易》也呈现交叉形式而各相倚重。《易传》作为解“经”之作，融汇了先秦诸子的《易》道观，而以道家《易》道观居首，儒家居次。通过这种融汇，于是便有了“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的主题。《易》之《贲·彖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传》之作，目的在于“化成天下”。所以它强调“崇德广业”、“极深研几”。唯其如此，才能顺天道、

察民故，实现以天地为法，与天地合德的境界。这也即是“化成天下”的标准。《易传》所追求的这种境界，也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不同阶级、身份的人之间和谐统一，亦即个人与群体与社会与天地自然平衡协调。这其中的道家意蕴，可谓浓矣。《太平经》的主要倾向显然是道家《易》学，其于儒家《易》学方面也有明显的吸纳与表现。明乎此，则不至于有执偏之争。

《太平经》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以“道”释《易》，借《易》明“道”。实际上是将“太平”主旨建立在《易》理之上，是对先秦形成的道德传统的新发挥。纵读《太平经》，不仅可以鲜明地感到一以贯之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①的《易》道，同时还可以鲜明地感到《易》文化发展的时代脉搏。

首先，对《易》变革之道的继承。

《周易》六十四卦，正是靠最基本的奇偶(一一)爻画的变化推演来占断吉凶、休咎的。诚如《易传》所言：“《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的爻画所表示的刚、柔爻位的上下变迁，正是《易》道的基本原理和特色。所谓《易》，也正是取象于日月往来相推的变化。《周易》的变化，并非外在力量的驱使和主宰，它的根本动力在于易卦自身矛盾着的阴阳双方盈虚、消长，始终遵循着“物极则反”，“穷则变”的自然法则。换言之，这种变化是有规律可寻的。《周易》把这种变化看成是事物新

^① 《易传·咸·象传》。

故相除的机制，特别强调“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但是在方法论上它却陷入了循环论。它从直观经验出发，认定事物的变化都是日月、寒暑、昼夜的代明错行，始终在一个固定周期的模式中循环往复。这种背反，终致因扭曲了事物的本质而扼杀了辩证法则的生命。作为一种传统观念，其影响是深远而严重的。

《太平经》的主旨，正是建立在“尚变”的《易》理基础之上。《汉书·李寻传》载，方士甘忠可诈造的《包元太平经》问世时便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他就是基于这种循环理论，名正言顺地授徒传播《太平经》的。甘忠可终以“假鬼神罔上惑众”罪被治，病死狱中，但其书却继续流播。我们从东汉经过民间流传扩演的《太平经》看，这种物极必反的变化观多有反映。如说：

“……道弊末极也，当反本。夫古者圣人睹此知为末流，极即还返，故不失政也，而保其天命。”“积上者当返下，极外者当反内，故阳极当反阴，极于下者当反上；故阴极反阳，极于末者当反本。”“夫末穷者宜反本，行极者当还归，天之道也。”^①

“夫阳极者能生阴，阴极者能生阳。此两者相传，比若寒尽反热，热尽反寒，自然之术也。故能长相生也。世世不绝天地统也。”^②

在《太平经》看来，本末、上下、内外、寒热等等，举凡对立的范畴，如同《易》之阴阳，“极即还返”，这是“自然之术”，是“天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人类遵循这种自然之道，男女阴阳和

① 《太平经》卷四十二，《四行本末诀》第五十八。

② 《太平经》卷三十六，《守三宝法》第四十四。

合，就能“长相生，世世不绝天地统”；统治者遵循此道，就可以“不失政而保其天命。”《太平经》也认为，事物的生存和发展，其机制不是外在力量，而是事物内部的阴阳矛盾对立统一和斗争。如说：

“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养。一阳不施生，一阴并虚空，无可养也；一阴不受化，一阳无可施生统也。”^①“故纯行阳，则地不可尽成；纯行阴，则天不肯尽生。”^②

“自天有地，自日有月，自阴有阳，自春有秋，自夏有冬，自昼有夜，自左有右，自表有里，自白有黑，自明有冥，自刚有柔，自男有女，自前有后，自上有下，自君有臣，自甲有乙，自子有丑，自五有六，自木有草，自北有牡，自雄有雌，自山有阜，此道之根柄也，阴阳之枢机，神灵之至意也。”

“阴气阳气更相摩砺，乃能相生。”^③

“夫一者，乃数之始起，故天地未分之时，积气都为一，分为二，成夫妇。”“夫大神不过天与地，大明不过日与月，尚皆两半共成一，夫天地各出半力，并心同欲和合，乃能发生万物。昼夜各半力，乃成一日。春夏秋冬各出半力而成一岁。月始生于西，长而东，行至十五日名为阳；过十五日消，名为阴。各出半力，乃成一月也。男女各出半力，同志和合，乃成一家。天地之道，乃一阴一阳，多出半力合为一，乃后共成一。故君与臣合心

① 《太平经》卷五十六至六十四，《两题》第六。

② 《太平经》卷十八至三十四，《名为神读书》。

③ 《太平经》卷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七十，《合和阴阳法》、《还神邪自消法》。

并力，各出半力，区区思同，乃成太平之理。”^①

《太平经》在这里将《易》的阴阳之道具体化了。其一是指出了“天下凡事”的生养，阴阳二者不可或缺，它们都是对立统一的。其二是指出了万物相生，是阴阳二气“更相摩砺”的矛盾斗争的结果。其三是形象地提出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辩证法则，从而大大地丰富了《周易》的阴阳学说。

《太平经》的阴阳变化论，由于受到《周易》封闭体系的制约，也未能超越循环论的藩篱。如说：

“故天道比若循环，周者复反始，何有解已！”^②“无极之政，周者反始，无有穷已也。”^③

譬如世间的天、地、人，各分十六部，各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共四十八部。从天上皇到人下霸共组成一个治——乱——治的天道循环过程。天地人同本于元气，分而为三，各有始祖：

“故三皇者，其祖头也；五帝者，其中兴之君也；三王者，其平平之君也；五霸者，其末穷劣衰，兴刑危乱之气也。故到五霸，乃四分有其一者，天道其统几绝也。过此下者，微末不能复相拘制，比若大弱不能制强，柔不能制刚，少不能制众，道且大乱，不能复相理。故更以上复起。”“更以上始，此天地自然之性也。”^④

① 《太平经》卷一百三十七至一百五十三，《太平经钞·壬部》。

② 《太平经》卷六十五，《断金兵法》第九十九。

③ 《太平经》卷一百十七，《天乐得善人文付火君诀》第二百七。

④ 《太平经》卷六十六，《三五优劣诀》第一百二。

由祖头而中兴而劣衰，乃是一个循环周期，接着“更以上复起”，“太平气至”，然后又开始新一轮循环。把有声有色的社会进化史，窒息在一个封闭循环的思维框架中，而且说成是“天地自然之性”显然是曲说。这是对《易》道消极面的继承。

其次，对《易》中和之道的阐发。

《周易》之变化，在于舍两极而求中。《易经》不足五千言，其卦爻辞直接涉及“中”的范畴达数处；至于以“贞”、“正”为“中”者，所在多有；而断卦时以“中”断吉者则比比皆是。即以爻位论，二、五爻为易卦上下体之中爻，如得位，则多断为吉。至于《易传》之言中、贵中，更其表现明显。中和是中华易文化传统的精髓。

由《易经》衍生的道家《易》学和儒家《易》学，尽管所尚相歧，然对于“中和”这一精髓，都是肯定、继承和发扬的。老子说：阴阳二者“冲气以为和”，“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进而主张“和其光，同其尘”，告诫人们“多言数穷，不如守中。”^①尔后庄子更进一步提出了“缘督以为经”的养生、处世之道，强调“时中”之论、“环中”之旨。儒家孔子亦倾心于《易》之中道观念，希望能够“得中行而与之”。^②他主张“礼之用，和为贵”^③，盛赞“中庸”为天下之“至德”，进而提倡“执两用中”^④的中庸之道。尔后思孟学派把这一思想发展到了极至，把“中和”升华到了“天下之达道”的地位。

《太平经》内容虽然驳杂多端，但《周易》“中和”这一精蕴，却散见于全书。或者说，《太平经》是以《易》的中和之道贯穿全书的。

① 上引均见老子《道德经》。

② ③④《论语》：（子路）、《学而》、《雍也》。

《太平经》非常重视《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论题，不仅仅用这种思想说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而且用以说明庶物以及人类的生成、殖养问题和社稷国家的统治权力的延续和安定问题。《太平经》所谓的“兴国广嗣”之术，概言之莫非“中和”二字。《太平经》第四十八卷《三合相通诀》对其“中和”观有过较集中的表述。它说：

“气者，乃言天气悦喜下生，地气顺喜上养；气之法行于天地下地上，阴阳相得，交而为和，与中和气三合，共养天地。天地与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凡物。三气相爱相通，无复有害者。太者，大也；平者，正也；气者，主养以通和也；得此以治，太平而和，且大正也，故言太平气至也。”

“元气与自然太和之气相通，并力同心，时悦悦未有形也。三气凝，共生凡物。凡物与三光相通，并力同心，共照明天地。凡物五行、刚柔、与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万物。四时气阴阳与天地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兴生天地之物利。孟、仲、季相通，并力同心，各共成一面。地高、下、平相通，并力同心，共出养天地之物。蠕动之属雌雄合，乃共生和相通，并力同心，以传其类。男女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子。三人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家。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此皆本之元气自然，天地授命。凡事悉皆三相通，乃道可成也。”

“故古者圣人深知天情，象之以相治。故君为父，象天；臣为母，象地；民为子，象和。天之命法，凡扰扰之属，悉当三合相通，并力同心，乃共治成一事，共成一家，共成一体也，乃天使

相须而行，不可无一也。”

显然，这种“三合相通”的理论，是对《易传》天、地、人“三才”说和《老子》“冲气以为和”说的继承和发挥。所谓“三合相通”，并非哲学上讲“一分为三”或“合三为一”，而是在道分阴阳、一分为二的前提下对“中和”和人的地位、作用的强调。“中和”既是《易》道，又是《太平经》作者刻意追求的一种矛盾统一、同一、平衡的状态。举凡天地、刚柔、寒暑、高下、雌雄、男女、君臣等，皆可比况“阴阳”，“阴阳相得，交而为和”。阴、阳与和的统一，就可以共养成万物。所以，它说：“阴阳者，要在中和。中和气得，万物滋生，人民和调，王治太平。”^① 如果“与中和为仇，其罪当死”。^②

对于《太平经》的“中和”思想，向来有不同的批评，主要者是批评它的“阶级调和”倾向。历史地讲，处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的农民，希望有一个能体恤下民的皇帝；希望有一个能反映民间疾苦，支持和监督皇帝统治，沟通上下情况的大臣；希望人民能够自食其力，安居乐业，达到君、臣、民相互理解，这是合符情理的。尤其在早期封建社会，皇权思想是一种进步因素。因为在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即便是两汉之季，无论绿林、赤眉、铜马的农民起义，抑或黄巾农民大起义，也都是想取而代之，做个好皇帝。明代的朱元璋、李自成皆是其例。中国封建社会绵长，封建经济能得到长足发展，与《周易》所奠定的以“中和”为精髓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

① 《太平经》卷十八至三十四，《和三气兴帝王法》。

② 《太平经》卷六十七，《六事十治诀》第一百三。

哲学地讲,诚然,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是社会阶级矛盾斗争推动的。但这种矛盾斗争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具有进步意义。其一是,当一个政权已经腐败透顶,犹人之大疾,不能接受医治而更起,这时用斗争促其速亡便是合理的。如《周易》鼎革之卦,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其二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一种新的先进生产关系取代现存生产关系已经成为历史之必然,这时用斗争促其速亡,也是合理的。矛盾斗争并非目的,它只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方法,但并非唯一方法。这种方法要达到的目的是在新的基础上的矛盾平衡,亦即中和。譬如:国际均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经济的平衡和协调发展,以至于生态平衡的维护,医疗的救死扶伤等等,这些都是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它可以用斗争的方法,但更多地是用谈判、协调或自我调适的方法。《太平经》选择了后者。它一方面尖锐地指出了统治集团的腐败,指出“中古多失治之纲纪,递相承负,后生者遂得其流灾尤剧。”统治阶级“四远怨结,实闭不通,治不得天心,灾变怪异,委积而不除。”^① 告诫统治集团改弦更张,诏告天下,推行善政,否则便会遭到人民反抗而垮台。而这种结果,无论对于现在的统治者还是人民自身都是不划算的。统治者将会丢掉一姓之私的政权,人民将会罹于战祸,社会生产力将会遭到一次大破坏。另一方面,它又劝导人民百姓恪守中和之道,与统治集团相合一,同患难。当然,仅仅靠劝说统治集团认识到危机,推行中和之道,只

^① 《太平经》卷四十八,《三合相通诀》第六十五。

能是农民阶级和上层有识之士的一种善良的愿望。

(三)

中华易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形成了一套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思维方式。这是一种以辩证方法为主体的经验的、非形式逻辑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致力于“通几”,即《易传·系辞上传》所说的:“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系辞下传》说:“知几其神乎!……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何谓“几”?“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可见“通几”就是深究并把握事物变化之所以然。这种思维方式,从不同角度考察,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具有系统性、模糊性、协调性与包容性的特色。(二)奉常处变的循环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封闭性、循环变动性与崇尚绝对的相对性的特色。(三)寓理于象的形象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取象寓理性、典型经验性与类比推理性的特色。(四)得意忘象的直觉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具有超理性的偶然性和征兆性与象外之意的神秘性和理解的顿悟性的特色。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相区别。从横向看,它们以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为本体,结成了一个经验纵合型的多元互补的认识结构体系;从纵向看,每一种思维方式都贯穿了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原则。易卦系统,反映了作《易》者已经具有一种通过阴阳对立统一求得系统的动态平衡的意识。这种动态平衡意识,又决定了《周易》以中和为特色的天人和合的价值取向。

纵观《太平经》全书，可以说全面地沿袭、重点地发展了《周易》所奠定的这种以辩证法为主体的、经验型的思维方式。它尤其强调“天人合一”、崇尚绝对的天道循环和那种超理性的神秘的征兆性。

《太平经》认为，“夫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① 人的生命是精、气、神三者的结合。它说：“三气共一，为神根也。一为精，一为神，一为气。此三者，共一位也，本天地人之气。神者受之于天，精者受之于地，气者受之于中和，相与共为一道。”^② 正因为组成人的生命之精气神三元素受之于天，故天人实为一体，天地之道与人道是合一的。由是可知，天人之间是相互感应的。本来，把天地看作是客观自然现象，肯定天人之间的内在联系，承认人与自然之间存在感应关系，这是今天的自然科学所能证明的。比如太阳黑子运动，月之圆缺，海之潮汐，风雨雷电，地震、干旱等，都能对人产生直接影响，便是其例。但是《太平经》却从汉代的流行迷信中吸取了阴阳氾结之说，把自然与人的感应关系扩大到自然与人类社会；同时又把自然人格义理化，认为天是真善美的集合，主宰着人类世界。《太平经》这种天人合一的感应论，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为谴告说。即是说，上天始终都把君王的统治置于监督之下。对他们的善行或恶行用灾害与丰稔、乱与治来表示意见。君王行恶，便要受到谴告。如说：

“王者行道，天地喜悦；失道，天地为灾异。”^③ “夫大灾异

① 《太平经》卷六十六，《三五优劣诀》。

② 《太平经》卷一百五十四——一百七十，《令人寿治平法》。

③ 《太平经》卷十八至三十四，《行道有优劣法》。